

世貿香港宣言初步總結 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全球化監察

2006年2月

目 錄

弄虛作假，欲擒先縱 從非洲四國看這次世貿會議的結果	3
黎佩炎（《全球化監察》編委）	
香港宣言：出賣普羅大眾及環境的又一步	8
區龍宇（《全球化監察》編委）	
不要向世貿開放公營服務（轉載）	23
鄧燕娥（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主席）	
對世貿的民間回應	26
林致良（《全球化監察》編委）	
世貿與 CEPA	34
潘文瀚（《全球化監察》編委）	
全面取消紡織品配額制對工人是禍是福？	41
福 子（《全球化監察》編委）	
新左派與中國的未來 “中國與世貿”研討會記錄	49
HKPA 記錄組	
天下有罪，罪在世貿 抗議警方暴力鎮壓正義的人民抗爭！	56
聯合聲明	

弄虛作假，欲擒先縱

從非洲四國看這次世貿會議的結果

黎佩炎



非洲國家貝寧(Benin)、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乍得(Chad)、馬里(Mali)在這次世貿會議中被稱為棉業四國(The Cotton Four)。他們都屬於聯合國 191 個國家中所謂「最不發達國」的 50 國中之一員。自 2003 年在坎昆(Cancun)回合，他們把自己受到美國和歐盟大額補貼棉花所造成的經濟慘況公告於世後，引起多國和組織的極度關注。今次在香港，這四國能否與歐、美等發達國在有關棉花的貿易糾紛中得到較公平合理的對待被視為這次世貿《發展議題》成敗的指標。但，世貿這次吹捧的所謂「發展議題」又一次証明了這所謂「發展」只是一欲擒先縱的技倆，讓這個《香港回合》不致重覆 03 年坎昆(Cancun)回合談判失敗的經驗，以小恩小惠利誘發展中國家回到談判桌上，並讓發達國家最終有機會達到他們「劫貧濟富」的目的。

棉業四國中的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乍得(Chad)、馬里(Mali)同時是聯合國所謂的「被內陸包圍」的不發達國家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意思是他們都處於較偏僻的內陸地區，離海岸遙遠、交通不發達，故此較難以水路接近海外市場，造成他們經濟發展的先天不足。但他們和貝寧(Benin)的土壤和氣候都適合生產棉花，他們遂成爲單一種植(monoagriculture)的經典例子。棉花在四國佔出口總值的百分之七十，是四國唯一的出口產品，爲他們帶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出口收入。他們出產的棉花由 1980 年佔世界市場的百分之四，進展到 2002 年佔百分之十七；爲這四國的一千萬人口提供了生計，可算是非洲較成功的「發展」例子。

但好景不常，國際棉花價格在 2001 年開始不斷下瀉。成爲自 1793 年以來世界棉花價格最大的一次崩潰。世界最窮的中、西非國家因而合共損失了多達二億五千萬美元。而這次事件的起因正是由於美國給予本國二萬五千多名棉農多達 30.9 億美元的巨額補貼所造成。大量廉價棉花因而傾銷於國際市場，嚴重貶低了棉花價格，並打擊了這四國的棉花業發展。四國於是聯手向這不公義的政策作出反擊。他們於 2003 年默西哥坎昆(Cancun)舉行的世貿會議中提出他們的控訴。這些控訴在該次會議及接連下來的預備會議中都得到不少發展中國家、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熱烈的支持與和應。

棉業四國在這次《香港回合》的會場中對記者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所表達的意見，絕對顯示了他們要改變逆境和不願倚賴外國援助的獨立精神。來自馬里(Mali)的部長便曾在記者會中一口氣提出了數個對發達國家的訴求。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取消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和歐盟)的國內補貼(domestic support)。他亦希望發達國正視他們需要建立一個緊急基金，來應付棉價在國際市場波動的建議。在中長期他們亦希望吸收更多投資來強化本地棉花的競爭力。他們草議了一份建議書希望發達國的國內補貼至少應在 2007 年底削 60%、2009 年底削 20%並在 2010 年完全消取，出口補貼更應立即廢止。他們亦要求禁止發達國玩弄世貿裡的「紅綠藍盒」補貼制度，阻止他們把一些應該要剔除的補貼，轉換成可接受的補貼。他補充，在這些建議被採納之前，他們是不會作任何貸款，以免貸款會被浪費。

這些振興一國重點產業的建議，絕對是一國代表所應爭取的，亦做到了對症下藥、指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向。但觀乎《香港宣言》最後落實有關棉花的協定，卻顯得搔不著癢處，並有意迴避問題的核心。《宣言》中協定 2006 年底前取消棉花的出口補貼和承諾開放發達國的棉花市場，但這些都不是這四國最需要的藥方。之前已提及棉花貿易的扭曲歸根究底是國內補貼(domestic support)的問題，即強國以大額的金錢補助農業，縱容以本傷人的傾銷把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拖垮。但《香港宣言》卻

對國內支持這影響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命脈的問題視若無睹。就算 2006 年底前真能取消棉花的出口補貼，但是因為世貿現存的補貼制度充滿漏洞，發達國仍然能不斷的堂而皇之把出口補貼的錢換一個名目成為可接受的補貼來攤派，亦即是說基本上出口補貼的廢除不會阻止發達國對世貿制度的玩弄，繼續能把棉價人為地壓低。

另外，眾所周知，耗用棉花的成衣製造業早已不是發達國家的產業，相反是一班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才是棉花的主要入口市場。但即使是中國這個棉花高耗用國的棉花生產地區—新疆--現在也要面對國際棉價過低所引致的滯銷。對於非洲這四國，開放了棉花耗用量不多的西方市場又有何幫助？

其實現在已有跡象顯示，今次發達國承諾作出的諸種讓步，如加速降低關稅，開放市場，在 2013 年取消(出口)補貼，表面上是作出了讓步，但其實一來是為了減輕國內的財政負擔(歐盟的農業補貼是世界之最、而美國的財政赤字亦冠絕全球)。二來他們只是行拖延整兵之戰術，在未有削減太多的補貼之餘讓自己的農業慢慢調整過來，讓國內的農產品價格能調整至與國際價格水平一致，到時候當所有國家都要開放農產品市場時，他們的食物大企業可以買回本國的產品，而他們農業既能夠維持自身的競爭力，當市場開放後，便能增加銷路。三來正如評論所說，農業佔歐盟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到

百份之二，但服務業卻佔達百分之七十五，故此農業只是歐盟和美國的談判籌碼，最終目標仍是要促使發展中國家開放服務業市場，讓他們能進一步掌控全世界的命脈。

此外，《宣言》裡有關「發展」的協定讓「最不發達國家」的百份之九十七的產品能以「零關稅、零配額」進入發達國家的市場仍是充滿漏洞，美國便聲言可能會把一些工業產品排拒於外，這絕對妨礙了「最不發達國家」欲透過正如中國現在進行著的，以工業化來達到產業升級、發展經濟的道路。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千方百計、七情上面編導演的「發展議題」到底有多少是真心想別國發展，到這裡可說是不言而喻。

2005 年 12 月 27 日

Reference:

Sophia Murphy, *The New Blue Box: A step back for fair trade.*

Jacques Berthelot, 'The WTO: Food For Thought' *Le Monde Diplomatique* <http://mondediplo.com/2005/12/10food>

Jacques Berthelot, 'Blue, Amber and Green: The Three Box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http://mondediplo.com/2005/12/11box>

香港宣言：出賣普羅大眾及環境的又一步

區龍宇



世貿談判發生的同時，大家會關注什麼呢？

2001 年開始的世貿多哈回合談判，中間經過 2003 年的暫時失敗，終於在 2005 年 12 月的香港部長會議達成局部協議，為 2006 年達成全面協議作進一步準備。

多哈回合被前任世貿總幹事稱為「發展回合」。但是從頭起這就是有意誤導，並且在這次「香港宣言」中暴露無遺。對於強國及跨國公司來說，這次談判的主要目的，就是用幾顆糖果為籌碼，來進一步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其他市場，把更多社會領域和自然資源變成商機。

農業協議：肥的瘦的一鍋煮

這幾顆糖果，首先就是備受注目的、2013 年取消農業出口補貼¹。這個協議針對的是美國及歐盟，

¹另一顆糖果是對最欠發達國家的優惠：在 2008 年前，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向最欠發達國家至少 97% 的產品，提供免關稅和免配額市場准入的「雙免」

因為只有它們才有這個財力去大量補貼出口。但是，歐美花得最多錢的，不是出口補貼，而是國內補貼。1999年，歐盟每個農夫平均獲得16028美元補貼，美國則是20803美元²，比許多發展中國家每年人均收入只有幾千美元還要高。許多發展中國家農夫所得到的補貼少到幾乎不值一提。本來，按照世貿農業協議，相當部份國內補貼也要逐步減少以符合所謂自由貿易。³但是，在多哈回合，從2001年的部長聲明一直到今次香港宣言，「大幅削減國內補貼」的空話說了又說，卻始終沒有定下任何期限。可以說，最能夠暴露富國在推行「自由貿易」上的偽善，就是農業協議。

那麼，如果有一天歐美能夠拋棄偽善，連國內足以扭曲貿易的補貼也按照自由貿易精神大幅削減直至取消，是否就表示公平呢？就表示農業協議是好的協議呢？不是的。因為農業協議本身並非單方面要求富國削減補貼，而是把發展中國家（除開最窮的幾十個小國之外）捆綁一起，要後者也一併削減，只是在分期削減上，稍比發達國的六年期長四年，即十年而已（從1995年起計）；在削減幅度上也稍比發達國的20%稍低，亦即13%而已。這種肥

優惠。目前全球共有50個最不發達國家，他們的人均年收入低於750美元。最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還不到全球的1%。

2由於補貼是按照農場大小來進行，所以小農所得，在比例上遠遠不如商業性大農場。

3主要是被稱為黃箱的農業補貼須要削減。但是，所謂藍箱補貼，也會有「扭曲」貿易的成份，但是却可以保留。

瘦一併綑綁根本是欺負弱者，因為歐美一年農業補貼可以達到 1700 億美元⁴，它們減到 20%，仍剩下天文數字的補貼；窮國的補貼微不足道，再削 13% 等於是落井下石。上一輪談判已經是以強凌弱，今次多哈談判繼續這個精神。香港宣言已經明顯表示：第一，發達國根本不願意按農業協議精神再逐步削減國內補貼，除非發展中國家願意在服務業及非農產品市場開放上作出更大的讓步。第二，農業協議的精神就是把窮國與富國一窩煮，一併限制它們實施農業補貼，最多在談判中稍為給予窮國一點點「優待」而已。有人說，大家都逐步取消農業補貼，就能保證農產品的國際貿易上實現真正的市場價格而非扭曲的價格，就能根本解決歐美對發展中國家的傾銷。這個說法，即使成立，也不可能真正解決貧國與富國在農業上的失衡。因為即使現在歐美廢除了農業補貼，不再以低於成本價來傾銷，富國的農業在國家長達大半個世紀的補貼下，早已發展為機械化的石油農業，在生產力上遠超窮國的小農經濟，後者仍然難以同前者競爭。

這就像一個西洋拳比賽的班主，他對甲拳手不斷給予最好的補品和最好的訓練，對乙拳手卻既不讓他吃飽，更不給任何訓練。有一天，在甲乙決賽前一個星期，班主終於決定實行「平等原則」：甲乙都只能吃普通飯菜和接受普通訓練，但是我們能

⁴歐盟在 2002 年光是花在國內補貼的金額已達 860 億美元；美國在 2002 年的新的農業補貼法案打算把補貼增加到 820 億美元。

夠說這樣真正符合平等原則嗎？要真講平等，就不應該在最後一刻去同時禁止對雙方給予優惠，而是把優惠倒轉過來，讓甲吃普通飯菜和接受普通訓練，又讓乙獲得最好的補品和最好的訓練。同樣地，如果世貿真講照顧窮國，就應該請它一方面取消歐美的農業補貼⁵，另一方面不僅繼續容許窮國保留農業補貼的權利，而且要富國用無私的援助去提高後者的農業發展水平。

發達國的農業發展，如果沒有國家的補助，就沒有今天。所以西歐戰後一段長時間都是農業淨進口國，但八十年代初已經變成農業淨輸出國了。等到西歐以國家補助來大力發展農業之後，它才忽然奏起自由貿易的迷曲，要一體限制富國與窮國的農業補貼了。窮國從此被剝奪了部份國家主權，不能保護小農和給予補助。今後它們即使忽然變富(例如突然發現石油)，它們也只能不斷減少農業補貼，不能再有任何增加，這不啻於毀滅窮國小農的發展前途。這樣的農業協議，根本是強凌弱的壞協議。惡魔只能生下惡魔。在它的框架下進行的談判及其結果，都不可能真正惠及窮國。那種希望通過談判，通過增加發達國市場准入來保護窮國農民的利益的想法應該讓它壽終正寢。

NAMA：把海洋與森林出賣給世貿

⁵歐美的小農所獲補貼可以考慮保留。

發達國願意 2013 年取消早該取消的農業出口補貼，目的不過爲了迫使發展中國家同意開放所謂「非農產品市場准入」(NAMA)。這不過是小往大來的把戲而已。現在香港宣言終於確定要就非農產品市場准入展開談判，標誌著世貿進一步擴大它的管轄的範圍。世貿同它的前身關貿的分別，首先就是後者的涵蓋範圍很小，沒有包括農業、纖維產品和服務業。1995 年成立的世貿首次包括了所有這些範圍。但是發達國不滿足於此，所以就用取消農業出口補貼來作爲迫使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的籌碼，搞出一個什麼 NAMA 談判。什麼叫「非農產品」？有人以爲主要是指工業產品。但是這不正確。2001 年的多哈部長聲明說得很清楚：「其所涵蓋的產品是全面的；不會有任何產品能夠事先剔除在外」(附件 B 第 21 條)；就是說，除了農產品之外的一切產品。香港宣言舉了例子，除了工業產品外，NAMA 可以包括漁業、林業、各種原料，特別是貴金屬。

全球 3 億 5 千萬依靠樹林生活的小農和原住民，以及 4 千萬小漁民的生活來源，從此就變成世貿框架下的買賣，讓跨國公司更方便地剝削他們。難怪這次部長會議，有亞洲各國的漁民團體參加抗議，喊出「把漁業剔除於世貿之外！」的口號。只要看看世貿把農業納入「自由貿易」之後對各國農夫的打擊，就會明白漁民的反對是大有道理的。其次，NAMA 談判也引起環保團體的關注，因爲這是世貿第一次把海洋和森林資源納入其範圍。而過去無數

的世貿案例已經證明，世貿實際上是把跨國公司的商業原則凌駕於環保原則、人權與勞權保護之上的。現在再加上 NAMA，那麼，早已過度使用的海洋和森林資源就更受到威脅。事實上，世貿部長會議的談判草稿(12 月 7 號版本)，明確要「消除有關環境產品和服務的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而所謂「非關稅貿易壁壘」，往往指的就是各國保護人權和環境的法律。雖然正式的宣言刪除了這一點，但是，第一，這充份說明起草者的原來企圖。第二，正式的宣言仍然保留如下一條：要在多邊環境協議(例如〈有關受威脅物種的國際貿易的公約〉)的秘書處和世貿之間建立正式和經常的交換資料的渠道(宣言第 31 條)。世貿要和多邊環境協議的秘書處發生這樣一種關係，簡直就是「鱸魚探望小蝦」，不安好心。一直以來，許多大漁業出口國都想迫使那些沿海有比較豐富的魚類資源的國家公開它們的有關資料。香港宣言正式通過了上述一條，會不會增加大漁業出口國強索資料的權力？這是令人擔心的地方。

NAMA：幾顆糖果換取別人的身家

「非農產品市場准入」談判引起發展中國家的民間團體另外一個不滿的，就是第一，進一步限制了發展中國家運用關稅來保護自己的幼稚工業的自主權；第二，宣言所採取的關稅減讓公式(所謂瑞士公式)本身就不公平，因為這使發展中國家的減幅

比發達國家爲大。兩個方面加起來，將極爲不利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

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的差距本身是歷史遺產。同時，發達國的多年來的關稅政策又在強化這種世界不平等。經過多年來的發展，發達國家的關稅結構變得特別不利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稅一般已經降得很低，但是發達國對於落後國家的出口卻維持較高的關稅；另一方面，爲了能有效剝削第三世界的自然資源，富國對於落後國家出口的關稅設計成這樣：上游產品(主要是原材料)的關稅偏低，但是越是往下游產品移動，關稅就越高。所以發達國對於第三世界的原木出口，關稅很低，以鼓勵進口；對於第三世界的傢私出口，關稅很高，以打擊進口。這樣關稅稱爲「關稅飆升」(tariff escalation)。這種設計分明是要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原料，同時妨礙其工業化，延續殖民主義與宗主國的分工模式。

如果多哈回合真正是發展回合，就應該這樣糾正這種不公平：要發達國根本廢除種種妨礙落後國的工業化的關稅制度，同時不強迫發展中國家減讓關稅。發展中國家不一定時時都須要高關稅，但是一定時時須要擁有關稅自主權，因爲關稅是它們很重要的發展工具。事實上，發達國當年也是靠高關稅來發展自己的工業的。但是現在這個 NAMA 的談判根本不是這樣，而是相反。按照所謂瑞士公式的關稅減讓，發展中國家將會減得比發達國家厲害，

損害前者的工業化。當然，即使是發展中國家，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一樣很大，所以這種損害不會是劃一的，而是同樣會有很大差異。這個事實進一步說明，世貿那種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採取同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原則——「自由貿易」必好，「保護主義」必壞；關稅減讓必好，高關稅必壞；出口越多越好，越少越壞——這根本就是荒謬的。

服務貿易：借自由貿易之名偷運自由投資

發達國在這次談判中另一個進展是繼續推進服務貿易談判。從 2000 年開始有關談判以來，發達國一直不滿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承諾開放其服務業態度消極。這樣有啥希奇？大家都知道，服務貿易的優勢全在發達國一邊。全球七成五的服務貿易都屬於發達國。窮國向發達國開放服務貿易，不啻於引狼入室。本來，按照服務貿易協議，任何國家對於是否參加有關開放市場的談判，是否作出承諾，完全基於自願原則。所以它們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抗拒，歐美在這次部長會議未竟全功。12 月 7 號的草稿本來想強迫發展中國家非要參與開放市場的談判不可。草稿上是這樣寫的：只要有國家向其他國家表達了進入其國內市場的興趣，後者「就要同這些國家進入多邊會談，以便考慮這些要求。」(附件 C 第 7 條) 12 月 18 號的香港宣言減弱了口氣，刪去了「就要同這些國家進入多邊會談」這種無理要求。但是新文本仍然把服務貿易談

判向前推進了一步，那就是把本來的雙邊談判變成爲多邊談判。從前是各發達國分別向，比方說，斯里蘭卡，要求展開市場准入的談判，今後就變成多個發達國，聯合向斯里蘭卡施壓。由於斯里蘭卡欠下歐美許多債務，所以凡是這些談判，本來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對等談判。現在再加上多邊談判，那些小國更是處於極爲不利的地位。

其次，附件 C 規定各成員國要「盡最大可能」在四種服務業提供模式⁶上進行進一步貿易自由化的談判，特別是在外資投資、外資的服務人員跨境流動等幾個方面。先說外資投資問題。我們早就說過，世貿組織的要害正正在於，它不僅推動所謂自由貿易，而且推動自由投資，幫助跨國公司自由地經濟入侵各國市場。要知道，不論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有多好，他畢竟談的只是貿易，而且只是產品貿易，不包括服務貿易，更不包括自由投資。現在，〈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所謂第三種模式(商業存在)，說白了就是世貿假借自由貿易之名來偷運投資自由。本來，世貿所謂自由貿易，其實就是把跨國公司的商業利益凌駕於勞權保護和環境保護，並且爲此而限制了各成員國的管理經濟的權力。而自由投資本身，比所謂自由貿易害處更大得多，因爲國際商品的買賣畢竟要一次又一次地進行，其爲善或爲惡，有效期都比較短。外來投資就不同了。外來

⁶四種服務業提供模式，分別爲跨境提供服務、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投資是對本地的勞動及自然資源的長期而直接的利用，如果本地政府喪失了對其管理的權力，那就變成外資隨意剝削本地勞動及自然資源，對本地弊多利少。

服務貿易：化公為私，假公濟私

所謂服務業，還包括了許多本來是公營為主的部門，例如食水、教育、醫療、護老、郵政等等。先是〈服務貿易總協定〉將之納入貿易，繼而在香港宣言中力推各國要在明年達成擴大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協議，那就等於宣佈要推動各國大規模的私有化，並讓外資收購本地最重要的公共資產。

香港宣言只是規定一個大方向，但同時已經正式定下了繼續就服務貿易展開談判的日期：

- 2006年2月28日前，想向其他國家要求開放服務市場的國家，聯合提出多邊的要求清單。
- 2006年7月31日前，凡是接到開放請求的國家，須提出第二輪的修訂開放建議。
- 2006年10月31日，接到開放請求的國家要提出承諾定稿。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向世貿成員國提出開放本地環境服務的建議，並且按照上述時間表，將會在明年年底之前達成協議，所以香港的社會運動要

爭取時間，及時阻止它把現在由食物環境及衛生署、環保署、渠務署等負責的公營服務出賣給私人。

至於所謂自然人流動，這是為跨國公司度身訂做的條款，方便它們把廉價勞工直至廉價專業人員從第三世界送到發達國家來取代其原有的員工，然後付以第三世界的工資。

發展中國家的分化

這次香港部長會議多少推進了多哈回合的談判。所以不少批評世貿的國際民間團體表示失望。有些人就指責印度、巴西等領導 G-20(20 個發展中國家的聯盟) 的大發展中國家被歐美收買，出賣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們卻輕輕放過了中國政府，實在有點奇怪。因為中國政府的立場同樣是很清楚的，只要發達國願意給發展中國家一點點甜頭，中國就會全面支持所有發達國的議程，即 NAMA 和服務貿易談判。薄熙來轉述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呼籲，「希望有關各方拿出更大的政治誠意，顯示必要的靈活性，積極推動多哈發展回合談判進程，力爭在香港會議上取得實質性成果。」中國代表團也全程參與所有綠室協商，這些綠室協商只包括發達國與少數大發展中國家，同時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摒諸門外。與會中國代表馮軍表示，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期望甚高，希望中國能挺身而出，替發展中國家爭取利益。但是這種希望是

肯定要幻滅的。薄熙來說得很明白：「中國在某些中低檔產品上也有著自己的優勢，因此也希望能夠開發新的市場。」中、印、巴三國曾經在 2003 年坎昆會議阻止發達國強硬推動談判，只是因為當時同歐美還沒有談好雙方妥協的條件而已。一旦談妥(天知道三國跟歐美還有什麼檯底交易?)，它們自然就不再「反帝」了。

以為所有發展中國家有共同利益，可以結成長期的同盟去抵抗霸權主義強國，這種幻想也應該破滅了。首先，發展中國家也分大小，而國際政治從來都奉行強凌弱、眾暴寡的森林原則；大的發展中國家欺負小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就是家常便飯。中、印、巴三國的政府，現在的如意算盤就是利用其大國優勢去同時打開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不論其社會及環境代價。不論三國政府的一時一地的策略會怎樣變，其根本立場則萬變不離其宗，就是首先為自己的大企業奪取更多世界市場份額而服務，而非為自己或全球的勞動人民服務，當然也不會真正為其他較為弱小的發展中國家服務。中國政府力圖把自己的中低檔工業產品推銷全球；印度夢寐以求地希望發達國開放自然人流動，好讓它的軟件工程師都跑到美國來賺外匯；巴西首先要為自己的大農場打開更多市場。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三國政府都願意同歐美合作。當然彼此之間仍然會有矛盾，但是，在商業利益上，共同利益是主要的，

矛盾是次要的。以爲它們會貫徹始終地對抗歐美、維護較弱小國家的利益，難免要失望而回。

上述分析也回答了一些人的疑問：爲什麼發展中國家今次會屈服？其實，只要歐美拉攏少數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餘小國的部長，要麼自己也是商界公僕，只知爲商界打算，不理工農死活；要麼就是自慚形穢，在強權政治中答不上話，或者兼而有之。結果當然就最多只敢埋怨，不敢動真格反對。那兩個「反帝」最力的小國，即古巴和委內瑞拉，也只敢表示「保留」而已。

世貿與黑社會

有人總是希望能夠通過游說去促使世貿變好一點。這是沒有的事。惡魔只能生下惡魔。世貿 18 個主要協議，都是爲了建立這樣一個美麗新世界而度身定做的：先把保護人權、勞權、婦權和環境的法律當作「貿易壁壘」；以便跨國公司加以打倒。這樣，跨國公司就可以享有全面的貿易與投資自由，亦即全面的剝削人和自然的自由，不受任何民主監督，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ABB 工業集團的主席有這樣一句名言：「我把全球化定義爲：我屬下的所有公司享有想到哪裡就到哪裡投資的自由，自由決定生產什麼，自由買賣想買想賣的東西；來自勞工法例及社會公約的限制則盡量少。」它們今天還未達到這一步，這是對的，但是如果普羅大眾不及時

根本反對世貿，尤其是不根本反對世貿背後的大財閥，到達這一步不會是很久之後的事。

從第二次大戰到 20 世紀 80 年代或者最晚 90 年代，如果包括香港在內的世界許多地方，普羅大眾生活多少有了改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種社會運動迫使政府用法律、財富再分配和發展公營部門來限制了資本把商業利益完全凌駕社會之上的權力。過去二十年，可以說是大財閥全面反攻倒算的時期。所謂全球化時代，說穿了就是這句話。但是任何社會制度、社會政策，都是人爲的東西。人可以建設合理的制度和政策，也可以改變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問題只在於怎樣對症下藥。

經過這次世貿第六次部長會議，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這個世貿組織，完全不是爲勞動人民服務，更不是爲保護環境而服務，而是爲大財閥和統治精英的全面反攻倒算而服務。不可能寄望它會有好的協議，正如不能希望惡魔可以生下天使。有人說，窮國雖然知道世貿不好，但是沒有世貿可能更壞，因爲它們那時就要面對一個全無規則的弱肉強食的世界貿易制度。說這話的人不知道，所有黑社會在踢人入會的時候也是這種說法：加入黑社會，你才得到保護，不然就更可怕，變成完全不受保護。面對黑社會這種不請自來的「保護」，稍有頭腦的人都寧願避之則吉；社會改革家更一定會矢志消滅能夠產生黑社會的社會病根，而決非同流合污。對於世貿也該這樣。事實上世貿就是一個按照弱肉強食

的規則打造的國際黑社會。在無規則的弱肉強食和有明文規則的弱肉強食之間，任何有點民主風骨的人，都不屑於汲汲計較二者的優劣，而是二者皆拋，並專以全面的社會改革為職志。

2006年1月9日

不要向世貿開放公營服務（轉載）

鄧燕娥



世貿第六次部長會議在即，服務貿易的談判也密鑼緊鼓地進行。特區政府已經向世

貿作出開放環境服務的建議。由於環境服務這個界別可以包括公營服務，這勢必影響食環署、環保署等公務員的飯碗。可是政府這樣做之前，既沒有及時諮詢工會，也沒有公開所有資料，是違反最起碼的公正和公開原則。

我們多次向工貿署表達憂慮。官員的例牌答覆都是：一、服務貿易總協定根本不包括政府服務。二、他們向世貿承諾開放的只是私營部分，不會開放公營部分。三、世貿無權叫香港進行私有化。

徵垃圾費變「商業運作」

第一點根本錯。的確，服務貿易協定的第 I : 3 條指「為政府當局運作所需而提供的服務」不包括在協議範圍內。但是該條還有下文。第 I : 3 (c) 條接 指明只有當這些政府服務「不以商業原則運作，

市場上亦無一個或以上同類服務的競爭者」時，才不包括在協議範圍內。那麼何謂「以商業原則運作」？世貿官員認為只要是收費的服務，都可以理解為「以商業原則運作」，因此視作開放之列。

仲裁機構擁有解釋權

就環境服務而言，由於政府已決定徵收垃圾費，所以一旦政府向世貿開放有關服務，公營清潔服務也可以被世貿理解為「以商業原則運作」的服務，因此不屬「政府服務」，不能免於開放。

至於第二、三點，可以說是半真半假。的確，只要香港政府一天不向世貿承諾開放包含了公營服務的界別，世貿都無權叫香港進行私有化。但問題是政府已經明確向世貿承諾開放環境服務，那就表示香港政府從此喪失了保護公營服務的部分權力。因為世貿法凌駕所有成員國/地區的法律。一旦簽署協議，環境服務哪些屬於「政府服務」，哪些不屬「政府服務」，香港政府都沒有解釋權。全部解釋權都在世貿的仲裁機構手上。到時只要跨國公司認為政府不公平對待他們，他們都可以向世貿投訴，然後由世貿裁決。這時政府自己即使有保護公營服務這個良好願望，可是實際上對世貿沒有法律效力。

跨國公司可隨時投訴

世貿的要害，不在於它能立即命令香港政府外判服務。要害在於它縮小了政府管理經濟活動和發

展公營服務的權力，另一方面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及世貿的權力。假如發生嚴重疫症，私營清潔公司由於無法維持服務素質，構成了公共衛生危機，政府只好被逼把所有外判服務全面收回公營。但是這時跨國公司可以向世貿投訴，並有可能勝訴。

總之，政府如果一旦簽署開放環境服務的協議，日後本地公共政策應否改變和怎樣改變，就不是本地市民可以通過民主程序控制的事情了。

也就是說，即使到時香港有了雙普選，那個普選出來的政府也沒有充分權力去保護本地公營部門了。換句話說，人民即使可以改變政府，但是不能改變政策。要杜絕這種危險，只有根本地不開放任何公營服務。

原載《星島日報》2005年12月5日

對世貿的民間回應

林致良



自 1999 年美國西雅圖爆發大規模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簡稱世貿，WTO）示威開始，反全

球化運動⁷作為一個新興的群眾運動茁壯發展。這個運動的批判性、多元性和活力給人難忘的印象。今年 12 月，世貿將來港召開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預計也會吸引一萬多人參與抗議世貿的活動。示威者指世貿推動的全球化製造失業、貧窮和環境破壞。但是，不必諱言，本地民眾對世貿所知仍然不多，他們普遍以為受世貿影響的頂多只是窮國農民，對本地民生不會帶來衝擊。另一方面，特區政府非但沒有提供足夠的有關資訊供大眾參考，反而不斷誇大極少數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藉此來歪曲反世貿人士的形象。在這個情況下，本地團體推動抗議世貿的運動，倍感困難。

⁷其實這是個不準確的名字，許多反全球化人士自稱為「全球正義運動」或「反資本主義運動」。

其實，世貿對本地民生影響深遠。可是港府在世貿談判上一向黑箱作業，令公眾無從置喙；再加上統治精英一貫宣傳現在世貿所推動的那種「自由貿易」以至全球化都是好東西，而且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趨勢，由此造成公眾對世貿缺乏正確認識。世貿影響深遠，公眾卻毫不知情——兩者的差距恐怕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表現得那麼突出。本地團體更需要向公眾作耐心和細緻的宣傳教育，才能逐步扭轉這個局面。

世貿的厲害之處

比較世貿及其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簡稱關貿，GATT）兩者的分別，從中可以看到世貿的特點。首先，關貿只處理有限的貨物貿易，連漁農業、紡織品都不包括在內，世貿管轄範圍卻擴大到包括農產品、所有服務業甚至知識產權。其次，關貿只涉及貿易，但世貿擴大至投資，世貿協議裏面已有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和 2001 年世貿多哈會議上積極推動的所謂「新加坡議題」⁸談判，其實質就是允許跨國公司自由地在他國投資設廠，如果遭到拒絕，企業可以起訴東道國政府。世貿一旦通

⁸新加坡議題是指 1996 年在新加坡召開的世貿第一屆部長級會議上提出四項新的談判議題，分別是貿易與投資、競爭政策、政府採購透明度和貿易便利化。本來 2001 年在多哈舉行的世貿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已決定開始談判這四個議題，但由於各成員對談判出現重大分歧，因此世貿於 2004 年 7 月決定把新加坡議題的其中三個從多哈回合談判中剔除，只繼續貿易便利化這一議題的談判。

過這類協議，跨國公司的權力更加擴大。再者，比關貿大大擴充了管轄範圍的世貿，在自由貿易高於一切的原則下，驅使各國政府撤銷對人民必不可少的種種保障和補助，大眾享有的低廉醫療、教育、供水，還有環保立法，一律被視為貿易障礙而被拆除。世貿更盡力迫使一切生活領域變成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使過去由政府按大眾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務變成由大企業接管的生意。最後，關貿協議對成員的約束性較低，關貿容許成員享有所謂的祖父權，可以繼續保留入關前已存在的部分國內法律，即使這部分法律與履行關貿的義務相衝突，這種做法有利於發展中國家保留一定經濟自主權⁹。世貿卻硬性要求成員廢除與世貿協議相牴觸的本國法律。各國原先多少保障民生和本土工農業的法例和規則，都會因為入世而要廢止。世貿更賦予負責制裁的專家小組更大權力監督各國是否嚴格遵守協議，包括有權懲罰那些未符合「自由貿易」規則的國家。

因此，世貿不純然是處理各國貿易的機構，而是一個全新的權力體制，它通過貿易和投資協議，讓大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更自由剝削人民和環境。世貿的仲裁機制保證成員必須遵行世貿的遊戲規則。世貿可以說是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資本的經濟利益的憲政化。

我們可以以《服務業貿易總協定》為例，了解

⁹李鳴〈國際公法對 WTO 的作用〉，載於《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組織》，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86 頁。

世貿怎樣衝擊本地民生。

服務業貿易總協定：有錢才有服務

有人說，香港從來都是自由港，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所以世貿對香港不會造成額外的影響，沒有必要特別反世貿。問題是香港作為自由港，並非所有領域都屬於自由貿易的範圍。從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香港已發展出一套相當規模的公共服務，有一半居民住在公屋，市民更享受比較低廉的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但是，根據世貿 1995 年制定的《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包括香港在內的成員都要逐步開放服務業市場。可是《協定》所界定的服務業，可謂無所不包，舉凡醫療、郵政、供水、教育、護老、護幼甚至圖書館，都納入《協定》範圍內。根據世貿的國民待遇原則，一向由政府給予公共服務的補助（例如對公立醫院的住院費津貼），可以被世貿視為不公平競爭的手段，除非政府取消補助，或者給予相關行業的私人經營者同等資助。《協定》增加公共服務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壓力，方便跨國公司接管各國的醫療保健、教育、供水等民生部門。當公共服務變成牟利服務之後，服務就不再按人的需要而是按其付款能力提供；換言之，有錢的可享受更多更優質的服務，沒錢的就乾脆得不到服務。

政府官員說，《服務業貿易總協定》沒有推動公營部門私有化，因為《協定》第 1:3 條列明「為政府當局運作所需而提供的服務」不包括協議範圍

內，但是同一協議第 I:3(c)條卻指明當這些服務「不能以商業原則運作，亦不可在市場上有一個或以上同類服務的競爭者」時，這些服務才不包括在協議範圍內。有世貿專家傾向界定只有「免費或接近免費的服務」才算是公營服務，才可以豁免在協議範圍內¹⁰。而且大部份公營部門（例如教育、醫療、郵政）都存在「同類服務的競爭者」，所以一定會列入開放範圍。以加拿大為例，《協定》通過不久，美國速遞公司 UPS 就透過世貿仲裁小組，投訴加拿大公營郵政津貼本地郵件的做法屬於不公平競爭的手段，妨礙私營外國速遞公司打入加拿大郵政市場，最後世貿裁定加拿大敗訴，加拿大需要提高本地郵費。外國公營部門都不能倖免，何況香港。

服務業談判充份體現世貿的黑箱作業性質和它怎樣逐步蠶食民生。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服務業貿易總協定》「超乎尋常的邪惡，在於其同時給人兩個印象。首先，因為制定該政策的人置身隱秘，以至受不到批評和爭議。另外，該政策有很多後果，在實施之時（有時是有意）不被其承受者發覺。這些後果只有在相當長時間之後才會顯現出來，使受害者們不能馬上指控。」

11

¹⁰見 David Luff〈衛生服務管制和國際貿易法〉，載於世界銀行貿易與發展叢書之《國內管制與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196-199 頁。

¹¹布迪厄《遏止野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58 頁。

在最近一輪服務業貿易談判上，特區政府向世貿承諾開放環境衛生和潔淨服務，同時有國家要求香港開放護老及護幼市場。由於談判仍然繼續而政府又不把過程公開，所以目前很難評估影響程度。無論如何，公共服務開放私營後，公眾更難對服務實行有效的民主監督，而私營化後的工作待遇照例比公營前低。

使世貿出軌，終結新自由主義

從以上服務業談判的簡單介紹可知，世貿的「自由貿易」根本是由各國政府及其背後的大企業所推動，整個自由化協議的制定過程更離不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的參與。這就證明全球一體化並不如統治精英所說，是個不可阻擋的自然過程。今天所謂的全球化，不過是各國統治階級（首先是發達國家的統治階級）爲了挽救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經濟增長放緩，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的總和。這套名爲「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實質就是推卸政府對大眾的應有責任，同時給予大企業更大的剝削自由，降低民眾的生活水平，削減資本的勞動力成本，將經濟放緩的負擔都轉嫁到民眾身上。既然全球化不是不可阻擋的自然過程，是統治階級自覺推行的產物，那麼民眾也可以通過自覺的動員扭轉它。

認爲全球化令國家淡化甚至被架空，同樣不符事實。打造世貿和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過程，一刻都離不開國家的積極參與。跨國公司需要掃平投

資障礙的時候，更懂得找國家出面協助（例如通過本國政府向世貿提案或興訟）。國家也經歷了一個轉變職能的過程，即從原來的提供福利和管制資本的國家，轉變為可以為資本的全球流動提供便利和監督的國家。12

假如國家並沒有被架空，反而成為跨國公司推動全球化的共謀，那麼，民眾向著國家施壓，用集體行動迫使國家終止推行新自由政策，甚至運用國家權力創建平等、互助和真正民主的新社會秩序，就是一個可行的戰略。

針對世貿推動的自由化，部分民間團體已經提出「使世貿出軌」、「無協議比達成壞協議要好」的口號¹³，這個癱瘓世貿的戰略仍然需要通過向各國施壓，才能成功。1999年的西雅圖會議和2003年的坎昆會議，民眾動員（加上各國之間的矛盾）曾經成功使世貿無法達成協議，假如今年世貿在香港第三次不能達成協議，那麼世貿乃至整個新自由主義計畫將受到重挫；反過來，如果世貿順利通過協議，那麼世貿一度擱置的幾項關乎跨國公司投資自由的新協議（所謂「新加坡議題」）將重新開啓談判。刻下，本地民間團體正在要求特區政府首先

12見潘尼切《在國內開始（與結束）的全球化》，載《全球化動盪》，華夏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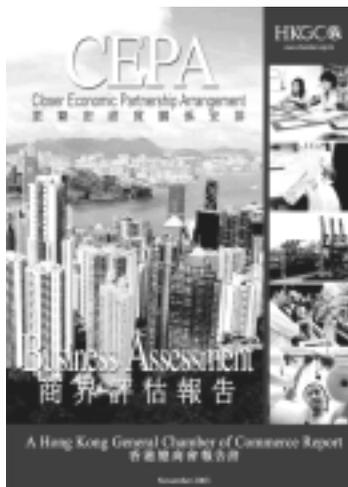
13見全球正義運動團體南半球焦點（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今年發出的兩份聲明“The End of an Illusion: WTO Reform,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Road to Hong Kong”及“10 Years is Enough—No Deal at the WTO Hong Kong Ministerial Meeting!” 詳見 <http://www.focusweb.org/>

把一切世貿談判內容公開，同時要求將本地所有公共服務剔除於服務貿易自由化談判之外，以此作為推動本地民間反世貿運動的初步行動。大眾急需認識世貿的真面目，以及政府在世貿的立場，從而確定下一步的行動。

2005 年 8 月 1 日

世貿與 CEPA

潘文瀚



CEPA 內容：源起，製造業及服務業

CEPA 全名為「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中文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單而言，這是一

個香港與內地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大幅減除兩地之間的貿易障礙——關稅及資格限制等。

CEPA 主要分為兩大部份：貨物貿易及服務貿易。在貨物貿易方面，內地給予香港製造的產品零關稅的對待，只要該產品部份生產工序在香港進行，即可享有此等對待。服務貿易方面，CEPA 開放十多個行業的限制，包括分銷、法律、會計、管理諮詢、醫療、建築房地產、保險、證券、視聽、銀行、物流、會展、旅遊、增值電信及廣告服務等。這些領域過去要求企業有較多的資本或營業額，可以涉及的業務範圍較少，或需要與內地企業合資經營。

這些限制都在 CEPA 的框架下被取消或減少。以醫療及牙醫服務為例，過去中外合資的醫院及診所聘請的醫務人員大多數需要為中國籍人士，但 CEPA 下香港與國內合資的醫療機構的員工可以大多數為香港人。而且香港醫生可以在國內有較長的執業期。而香港三所大學畢業生亦可參加內地統一醫師資格試。

中國在 2001 年加入 WTO，在未來數年將降低關稅及開放市場。中國政府為了讓國內企業可以嘗試接受開放市場的衝擊，所以與香港簽訂 CEPA，提早讓港商進入內地市場。換言之，其他國家可以在數年後享有大部份 CEPA 的條款，港人的優惠並非長久。

WTO 與 CEPA (FTA)

WTO 與 CEPA 可說是一脈相承，WTO 其實是一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各國共同商討如何開放市場，但由於各國之間的不同利益，WTO 會議難以使多國達成協議。因此，近年國與國之間更多達成的是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主要由國與國之間簽訂，CEPA 正是其中一例。不論是多邊還是雙邊的自由貿易協議，其本質都是一致：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更糟糕的是，WTO 與 FTA 互為影響。例如 CEPA 給予港商的優惠比 WTO 條項要多，所以 WTO 成員國必會要求得到一視同仁的對待，進一步開放中國（及香港）市場。

CEPA 能吸引更多港商及外國企業到港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政府宣傳 CEPA 其中一個論調是：因為香港製造業享有零關稅的優惠，因此可以吸引港廠或外國廠家來港設廠，生產高質素的產品，從而製造就業機會。但數據顯示，這個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極低。首先，2002 年，香港對內地的本產出口總值 53 億美元中，只有 16 億是輸往內地消費市場。而在 16 億當中，仍有大部份是機器及半製成品，真正供給大陸消費者的「港貨」少之又少。大部份港商都是為歐美品牌生產原設備，而非自創品牌。因為香港品牌遠遠不及歐美日的名牌貨品，所以港產品牌在國內市場份額所佔甚少。其次，即使有部份高增值（例如鐘錶）的生產回流，能夠僱用的就業人數非常之少，且集中在高技術的範圍，難以改善就業情況。

CEPA 協助香港企業開創內地市場，港人北上就業更有前途？

有學者指出，相對製造業，CEPA 對本港的服務業更為有利。因為降低進入門檻，令本港服務業可以大舉進軍內地市場。本港企業在內地拓展業務，可能會因此招聘一些香港管理人員到內地工作。但數目將不會很多，且對基層市民就業無甚幫助。而且內地員工的薪金跟本港員工有一定差距，港方管

理人員只會擔當過渡角色，待內地員工得到足夠的訓練，企業就只會聘請國內人士。情況跟九十年代的工廠技工一樣：當內地工人熟練工序後，就是本港技工失業之時。

此外，部份行業，例如會計及法律服務等，亦可能出現業務北移的現象。大量本港會計師及律師到國內開辦事務所，除了少數大型企業外，其他小企業可能會放棄香港的業務，造成更多後勤人員失業。

CEPA 對香港總體經濟有好處，最終基層都可以受惠？

另一個主流論述是：CEPA 增加兩地的貿易額，總體而言能夠帶活本港經濟，最終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受惠。但這種「滴漏效應」其實沒有任何實質的證明。首先，貿易額的增加與基層市民生活的改善並無任何直接甚至間接的關。本港的整體出口貨值指數從 2002 年的 99.2 上升至 2004 年底的 137.1，但同期的薪金卻不升反跌，與貿易最有關係的船務主任及船務文員月薪下跌 5% 及 3%。而低收入的職位薪金下降更多，司機月薪減少 8%，侍應生收入更少了近 12%。即使過去本港製造商在國內大賺特賺，很多資金確實回流到本港，但都只是流入樓市及股市，造成泡沫經濟。基層非但不能在「魚翅撈飯」的日子得到多少實惠，更飽受高樓價之苦。而當泡沫經濟爆破時，基層卻要承受減薪及裁員的苦果。

說到底，CEPA 對誰最有利？

港人目前持有的海外資產是本地生產總值的兩倍，相較日本（只有 30%），本港（富商）其實有很多財富及經濟活動在海外。CEPA 只會對港資（跨國企業）拓展中國業務更為有利。他們發財的同時，本地的工人，特別是基層市民，卻是沾不上邊。工人並不能像資金一樣可以到處遷移，當本地資金北移，造成服務業空洞化，工人只能留在香港接受失業減薪的命運。此外，CEPA 加劇了本港及內地的競爭（主要為服務業），內地企業為了保持競爭力，對內地工人的剝削及壓榨只有變本加厲。因此，CEPA 只是對規模越大的（跨國）企業，以及少數專業人士有利，對香港及國內的工人只會帶來更多的剝削。

前車可鑑：NAFTA 及 FTAA

雙邊／多邊（即兩個或以上國家／地區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近年越來越盛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NAFTA 於 1995 年簽訂，成員國包括加拿大、美國及墨西哥。成立之時就像 CEPA 一樣，承諾會為區內帶來經濟繁榮。但九年後的今天，NAFTA 為基層帶來甚麼？請先看看墨西哥，自由貿易令美國的玉米及其他農產品可以以超低價入侵墨國的農業市場，打垮本土的小農經濟。

農業難以維持生計，則農民只好跑到城市打工，為廠家提供大量的廉價勞力。製造業方面，大量的工廠由美國南移到墨西哥，令出口加工區的就業人數由五十多萬上升至一百二十多萬。但墨國的工人待遇卻沒有得到多少提升，墨國製造業工資下降兩成，全國貧窮人口由 50% 上升至 58%。此外 NAFTA 亦鼓勵美國重工業於墨西哥設廠，造成嚴重環境污染。而資本流動則令墨國金融市場波動性更大，1994 年的金融風暴令數以十億計外資一夜間撤離墨西哥。

美國方面，工廠外移造成大量製造業工人失業。據統計，美國流失近百萬個職位。很多老闆以遷移工廠為威嚇理由，阻止工人爭取集體談判權及其他應有權利。加拿大的原材料則以平價進口到美國，國內的工廠亦南移到墨西哥。而仍然留在美國及加國的職位，工資亦受到削減。

美國（企業）在 NAFTA 之下，盡享原材料及人力的優惠。因此，美國期望可以將自由貿易區範圍，由北美擴展至全美洲，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greement of America, FTAA）。但拉丁美洲國家不願意接受新一輪的殖民及剝削，FTAA 還有拉鋸的談判階段。

總括而言，雙邊自由貿易協議（CEPA, NAFTA 等等）所採取的理念跟 WTO 如出一徹：消除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障礙」，企業可以更自由進出不同國家的市場，加劇競爭及壟斷，造成貧富懸殊，利了（跨國）企業卻苦了人民。香港的製造業在八十年

代末已經開始北移，造成製造業職位流失。現在 CEPA 的落實則加速服務業的北移，本港的就業市場會進一步萎縮。

抗爭運動：向 FTA 說不

各地的勞工、農民、婦女及人權組織等已經聯合起來抗議當地政府簽訂自由貿易協議。例如南韓及台灣的農民都反對政府與外國簽訂 FTA，引入外國低價農產品。工會反對 FTA 造成工業及服務業外移，反對跨國企業剝削本土勞工。很多自由貿易協議跟 WTO 條款一樣，凌駕本土的法例，因此民間團體都抗議這種反民主的做法。

2005 年 6 月 1 日

全面取消紡織品配額制對工人是禍是福？

福子



紡織品及成衣協定（即多
織協定或配額制）經過 10 年的過渡期，終於在去年
底全面取消。2005 年初中國廠家立即大舉向美歐進
口成衣產品，結果引發美國及歐盟對從中國來的成
衣產品重新設立配額限制。¹⁴到今天中美與中歐之
間在紡織品貿易上的磨擦仍不斷成為全世界的關注
焦點之一。估計這種緊張的貿易關係會繼續出現，
而且不會短期內全部解決。

中國反對美歐重新設限的理據

美歐對中國重新設限引起中國非常大的反彈，
因為配額制本身根本是保護主義，而且是富國排斥

14 自今年 6 月 1 日起，美國已先後對來自中國的七種紡織及成衣產品重新
實施限制其成衣產品的進口數量。6 月中，中歐也達成新的配額進口數
量協議；但一個半月之後（即 8 月底），中國進口歐盟的成衣量已大大
超出雙方協定的數量，至今有約值 5 億港元的成衣產品滯留在歐盟的港
口不得其門而入。

窮國的保護主義，理應取消¹⁵。而 10 年前 WTO 爲了推行全球自由貿易化，也決定在 2005 年全面取消配額制¹⁶，開放市場，各國自由進出口紡織品。

但配額制取消不到三個月美歐又再向中國重新設限，反映歐美等鼓吹自由貿易的發達國的出爾反爾及輸打贏要的霸道行爲。所以歐美對中國紡織品重新設限顯然不合理，而中國批評歐美言行不一也很有道理。

但當中國振振有詞地批評歐美的霸道時，她是有点心虛的；因爲她清楚明白美歐對其重設進口限制是有法理依據的。因爲她在 2001 年底加入 WTO 時接受了其中一項條文：在 2008 年以前，任何協約國如有證據證明中國的進口擾亂其市場的話，有權向其暫時重設配額限制。¹⁷現在美歐只是根據雙方簽訂的協議辦事而已；中國不得不遵守“合約精神”。因此她只能大肆批評美歐違反自由貿易的原則，而不敢是說重設配額是不合法！

其實 1974 年設立的多纖協定從頭起就是歐美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工具。事實上，美歐對紡織品的貿易保護始於 40 多年前，當時歐美眼見成衣紡

15 富國不應對窮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但是窮國有理由對富國實行保護主義。

16 紡織品配額與農產品補貼被視爲自由貿易的兩大障礙。

17 《中國加入 WTO 工作組報告書》中的第 242 段就規定：一個 WTO 成員，如果認爲產自於中國的紡織品或服裝產品，由於市場擾亂、威脅阻礙了美國國內紡織品貿易的有序發展，美國就可請求與中國進行磋商，以期減輕或避免市場擾亂。

織產品大量從日本，南韓，台灣以及香港進口，於是設立配額制來限制其發展，目的是要防止後進國廉價產品大量湧進其市場，擾亂其市場及影響當地就業。問題是為何從前要大力保護的紡織業，今天又願意取消呢？很簡單，今天的紡織業在發達國已經是夕陽工業，美歐當然願意犧牲國內的夕陽工業來換取發展中國家向其開放更有利可圖的服務業和農業的市場。至於工人的死活，從來都不是統治者首要考慮的問題。

其實中國入世時所簽的特別保護措施(即容許美歐等國重新對中國紡織品設限)明顯是個美歐的陰謀詭計之一，因為 7 月中的中美就紡織品進口的談判就有這麼一個結果：經過一天的緊張磋商，美方在獲得了中方開放政府軟件採購市場，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承諾之後，明確表示將“慎用”特保措施。18

取消配額制對工人造成的影響

雖然上面提到配額制的設立首先是有利歐美，但後來配額制的確也使全球紡織品出口可以較平均地分散在近 200 個國家。它確保一些後起的及競爭力較弱的國家也可以分到配額。取消配額制肯定會打破原來的平衡，訂單會跑到最有競爭力的國家。據世貿報告的估計：取消多纖協定後，最終可能只

剩下 30 個較強的出口國家，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及巴基斯坦。據估計，中國紡織品出口的世界份額，將會由取消前的 16% 上昇到 50%，大幅搶去較弱的發展中國家的份額。而孟加拉、菲律賓、印尼等的出口將減半，墨西哥的份額更會大幅從 10% 下降到 3%。拿不到訂單的國家，工作機會就會大大縮減；失業會更嚴重。19

國際紡織、成衣及皮革工會最近一份報告指出：自今年年頭取消配額以來，非洲的窮國萊索托，已經有 6 間工廠關門，七千人失業。估計下半年會再多五萬八千人失業。萊索托九成九出口創匯來自紡織品，不難想見後果會多嚴重。柬埔寨有 20 間工廠關門，一成工人即二萬六千人失業。斯里蘭卡有 46 間工廠關門，二萬六千人失業。毛利裘斯估計會失去七千職位，孟加拉估計會失去一百多萬個職位。

其實，不但是窮國工人是配額制的受害者，歐美等發達國的製衣業工人也是受害者。過去 10 年間歐美等國已有過百萬的製衣業工人因資本外移到亞非拉等地及本國受外國大量進口廉價紡織品的衝擊而失業。21 所以配額制的取消意味著全球各國陷

19 據 IMF 的估計，配額取消後孟加拉喪失 230 萬個工作機會，土耳其、北非和東歐國家在部分品項上喪失歐盟市場。而一些毫無競爭力只靠配額才能出口的小國，例如斐濟、土庫曼、馬奇頓等國的經濟會面臨巨大衝擊。

20 其中有 80 多萬是美國紡織業工人。

21 其實歐美工人的失業問題也很嚴重，不過發達國平均比較富裕，較有社會保障，失業也可申領救濟金；工會力量也相對強大，工人有較多的政府及社會支持，可重新培訓後再轉業。但這些條件在大部份發展中國家

入更嚴重的「比賤競賽」。

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中國已被視為配額取消後的贏家之中的贏家。22但是我們要對所謂中國是贏家的說法有所警惕。首先，要知道外資佔紡織品總產值及出口創匯額的四分之一。所以中國企業並非獨贏，而是要給外資分一杯羹。其次，即使是由中國企業出口的那個部份，其實多數是為外國公司貼牌生產，前者只能拿到小部份的附加值，最大頭的利潤是落到後者口袋。由此可見，中國雖將成為紡織品大國，但最大贏家不一定是中國，而是發達國。其實，中國成為紡織品大國，這個事實本身根本是同美國商界利益基本一致而非衝突的。所以美國一部分商界和議員專門攻擊中國傾銷，主張限制中國的出口，或者延長配額制，而無一句批評那些從中國出口而發財的美國公司(如沃爾馬)，根本就是偽善，只是借題發揮。美國的總工會勞聯-產大追隨這些立場，以為可以由此而保留本國的職位，只是為人抬轎而已。因為阻止中國出口，後果只是沃爾馬從中國入貨改為從其他發展中國家入貨而已。美國的紡織行業職位

(包括中國)都不具備；就算法律上基本具備的地區，工人也絕不容易享得到。

- 22 中國的紡織及成衣業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起來的確有優勢；例如低工資(與高生產力相比)、早期已發展起來的完備基礎設施、技術及上游工業配套具競爭力、本地原料充足、完善的供應鏈及出貨日短等等

還是保不住的。畢竟美國的紡織業已經是夕陽行業。

還有一個方面是許多評論忽視的。中國紡織業的「崛起」當然會危及美國的同行的職位。但是中國紡織業的「崛起」本身，同樣是以大批裁員為代價的。中國工人並沒有真正得益，反而和美國工人一樣是受害者。早在中國入世以前，中國紡織業國企在 90 年代中已經進行大量裁員(下崗)，到 2001 年紡織業已經有 333 萬工人被裁，佔紡織業勞動力超過一半(52.5%)! 如果加上和這個行業有關的服裝和其他纖維製品、皮革製品業的下崗工人，裁員遠遠超過 400 萬。²³可是國際紡織、成衣及皮革工會鮮有計算中國被裁的紡織工人。

如果我們把握全圖而非像一些人那樣瞎子摸象，就會明白，真正的贏家，既有歐美商界大老闆，又有中國(包括香港)商界大老闆；真正的輸家，既有歐美的工人，又有中國工人，更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判別贏家還是輸家，根本不能根據國家的界線，而是要根據社會的貧富懸殊。只反對中國，卻不反對本國跨國公司和政府，客觀上都是中了政府和商界的圈套。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政府無可批評。其實中國成為配額取消的「大贏家」，其最重要的“比較優勢”正是中國工人特別受壓迫²⁴。中國工人不像印度、泰國、印尼等國家(雖然大家都是窮國)的工人那樣可

²³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04 (2003) 第 4 章 第 180 頁。

²⁴ 無論是國企工人或者是民工。

享有國際勞工公約所規定的勞動三權(即結社、罷工及集體談判權)。後一類國家雖然在實際執行勞法中常常大打折扣，可是還不致像中國那樣，工人完全被剝奪這些能與資本討價還價的權利。缺乏這些權利使工人無法保衛自己最起碼的權益²⁵，結果使中國的勞工成本特別低。

這種靠剝奪工人最基本權利來達致的競爭力，引發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進一步以工人作為犧牲品的惡性競爭，對雙方的勞工而言可說是災難性的雙輸局面。雖然發達國的工人也是受害者，可是他們失了業，多少有點社會保險。發展中國家工人就完全沒有這個福分了。所以我們應該更重視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惡性競爭及其對工人的影響方面。我們更應該批評中國政府這種政策。但是這種批評，同站在官商的貿易保護主義上面去批評中國，是大不相同的。

歐美貿易保護主義：是便車還是賊船？

爲了保護歐美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職位，全球有 220 萬工會會員的國際紡織、成衣及皮革工會在 2004 年連同 69 個成衣出口國要求延長配額。結果當然沒有成功。現在他們只好改爲呼籲世貿要正視他們的問題。其次，就是儘量附和歐盟(或者美國)利用

²⁵ 今天即使中國工人因長期被拖欠工資、被強迫加班、工資達不到法定水平、工傷或染上職業病得不到應有的賠償而發生罷工都時違法，誰帶領罷工誰就很可能進監獄或者被遣返原居地。

世貿協議中的「擾亂市場」條款來阻止中國出口。這種立場，簡單說就是想乘搭官商的貿易政策的便車來達到保護飯碗的目的。這註定是要失敗的。道理很簡單。這根本不是便車，而是賊船。發達國這些貿易政策，不論是保護主義還是自由貿易，其目的絕對不是爲了創造或者保障就業，而是爲了讓商界發財。這些貿易政策根本同創造職位沒有任何必然關係。工會要保護飯碗，倒不如直接用實力迫使政府創造就業機會，或者像美國一些民間團體所提出的，支持中國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待遇，扭轉全球工人比賤的方向。這樣發展中國家的工業也不致被剝奪生存空間。其次，美國工會與其附和政客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如把矛頭指向那些有份剝削中國或各國工人的美國大公司((如沃爾馬)，迫使它們大爲改善中國工人的待遇。總之，發達國的進步團體如果要爭取就業保障，就應該進行獨立的工運和社會運動，而不是與敵同眠，尾隨自己的官商的貿易保護主義。就算工會要講貿易，也應該是另一種講法，那就是要使貿易服務於勞權，而非像官商那樣相反。例如歐美工會大可以發起運動，要求立法限制歐美公司從嚴重違反勞權的國家入口。這樣不是貿易保護主義，而是勞權保護主義，是確保勞權凌駕貿易，而非相反。這是朝向全球勞動待遇一體向上提高的方向，是全球比好，而非像現在那樣全球比賤。

2005年9月17日

新左派與中國的未來

“中國與世貿”研討會記錄

HKPA 記錄組



中國問題，繼續成爲抗議世貿人民行動週的討論焦點。

由香港全球化監察，總部位於舊金山的美國全球化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sation) 和以泰國爲基地的南半球焦點(Focus on Global South)於2005年12月15日舉辦的“中國與世貿”研討會吸引到100多位中外人士參加，並展開了辯論。辯論的重點是新左派和胡溫新政在中國的未來中能起何等作用。來自中國的新左派學者韓德強坦率地表示，新左派並非站在工農的立場上聲討國家，而是爲了避免國家出現動蕩，而作出修修補補的工作。

文佳筠：中國是輸家

全球化國際論壇的文佳筠(Dale Wen)搶先發表了一份名爲：《使少數人富起來的改革——中國與通往經濟全球化之路》的報告。她指出，中國過去20多年，以國民生產值年均9%的速度增長，不

少人都認為中國從世界搶走了不少工作機會，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破壞了不少穩定的就業崗位，所創造地卻是血汗工廠式的職位，中國帶領了全球化的“尋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中國本身也是輸家。對於國企缺乏效率的說法是過份簡單的，爲了應付國家財政開支，國企被過份徵稅，稅額高達外資企業的數倍。更值得關注的是，教育和醫療系統的私營化，爲社會帶來了很深的危機。

中國的改革在 1992 年，是使用類似南韓的模式，對外資進行規管，但在 1992 後卻進行更激進的改革，趨向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革開放來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是靠市場經濟帶來的效率提昇，而是社會主義時期留下的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的成果。另一方面，改革並沒有如主流論述所說，解決了舊問題，相反是創造了不少新問題，例如環境的問題，貧富懸殊的問題，導致近年來，民間的抗爭越來越多。胡、溫政權開始看到問題，有別於舊政府只看重國民生產值的增長，推出了改良措施，例如在減收農業稅等等。

韓德強：：中國政府已經驚覺到危機

韓德強在其後的發言清楚表示，文佳筠的報告充份反映了新左派的分析和立場。他特別讚同文佳筠所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遺產所帶來的，包括：工人在 1980 年代國

企開始改革時對政府的信任，在 1990 年代政府壓制工人的能力，土地集中所有對減低鄉鎮企業成本的作用。但 1990 年代後，社會主義的遺產加速死亡，政府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所壟斷。他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前，已經有完整的工業體系。融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政策卻逐漸破壞了原有的工業系統，轉為生產量大，但低技術和人力密集型的模式。雖然中國現在有很多高科技產品，但核心技術不在中國。中國有發生類似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潛在可能性，危機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對於這一危機，中國政府已經覺醒到了。16 大以來，中國政策的主題已在轉變，例如強調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他相信，這一轉變是受到新左派的影響的。但是，韓德強認為，政府現時的政策不一定可以避免危機，假如仍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裡，不批判世貿、不調整招商引資的政策，就不可能有大的變化。而阻礙經濟政策重大調整的反對力量，是腐敗官員、買辦集團和民族資本(其力量還比較薄弱，主要是知識份子在起作用)。

嚴海蓉：尋找中國處境下的解決方法

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嚴海蓉回顧了中國近代以來的城鄉關係和移民歷史。在 19 世紀中期之前，城市和農村是一種彼此流通的關係。到了 19 世紀後期，外國商品進入中國，沿海通商口岸發展，城鄉關係開始變壞，受教育的人不願意回鄉。

在毛澤東時期，先將上海等殖民地通商口岸轉變為工業城市，後又將部份農村城市化，建立新的城市，例如大慶。總的來說，是容許資源下鄉，例如：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運動。

但到了鄧小平的年代，下鄉的資源越來越少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剩餘勞動力被迫外出打工。1950年代實行的戶口制度先是用來分割城市和農村人口，在1980年代還起到控制的作用，1990年代後，城市戶口的福利減少，農民開始可以透過買房子等方式取得城市戶口。城市工人、甚至大專院校畢業生，也和民工一樣，彼此競爭工作職位。這導致了工作條件的持續惡化，我們要尋找的是在中國處境下的解決方法。

區龍宇：：將民主並入社會正義

第四位講者全球化監察的區龍宇回應 WEN 和韓德強時表示，他們有不少共同點，例如都批判世貿和新自由主義，都關心勞工的狀況。但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就像一把刀一樣，持這把刀的人才是我們的敵人。在中國融入資本主義，將尋底競爭推向極端的過程中，我們要問誰是持刀的人。

他引用香港的情況，數十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民主普選，民主在香港人的意識裡植了根。早期有人在報章登廣告，宣揚自由、民主、公義是香港的主流價值。但是香港的主流價值中缺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平等。相反地，在中國內地，新左派強調正

義、社會和勞動保障等價值，但卻缺乏了民主。在中國，人們曾經相信周恩來、鄧小平或趙紫陽等領袖是好人，但他們在官僚制度下，都沒有發揮到作用，相反地，官僚體制是越來越強大。所以，我們的論述應該有一個新的起點，那就是將民主加入到社會平等的要求中去。

WALDEN BELLO：中國可以有不同的發展道路

南半球焦點的 WALDEN BELLO 最後發言，他表示自己雖然沒有在學術中研究中國，但中國對他們的影響從學生年代開始。他對中國和越南一類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判斷是，雖然融入了資本主義，卻和一般的發展中國家不同。革命的遺產，令這兩個國家沒有像他自己的祖國菲律賓一樣，受美帝國主義的控制。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東北亞模式和東南亞模式又不一樣。前者如韓國、台灣，政府在國家發展策略中有很強角色；後者如菲律賓，政府的角色很弱，較是新自由主義模式。但東北亞模式在世貿、世銀、國基會等國際機構的推動下，特別是 1998 年金融風暴後，政府角色變弱，管制放鬆，也已經傾向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模式前期是較類似韓國的，主要是發展外向型出口加工工業，市場卻沒有完全開放。但隨著加入世貿。關稅減低，情況也發生了變壞。

現在東盟國家在討論市場一體化時遇到了困難。不少工業轉移到中國，東南亞國家也充斥中國製造的產品。成員國家被迫考慮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但是，與中國融合的話，又擔心會被中國所壟斷。對於中國的霸權論，他表示，這主要是美國的軍方財閥所創造出來的說法，目的是製造一個具威脅的敵人，為其自己的利益服務。

最後他指出，中國存在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會對亞洲帶來影響。亞洲的進步力量應該團結起來，為中國和亞洲探索平等和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台下的討論

在五位講者發言後，來自多個的參與者紛紛發表意見：

一位瑞典人：在瑞典，人們相信自由市場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資本需要中共壓制工人。中國的可能出路是反對獨裁的社會革命。

一位泰國人：反對獨裁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要建立發揮工人民主的生產模式，要建立國際的團結。

一位香港人：中國要建設成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有可能的，但工人和農民要為此付出重大代價。所以，強國不應是中國人民的目標，中國人民應該連同其他國家人民，爭取基層民主。

一位英國人：他關心土地的私有化，和工人階級的組織問題。在策略上要考慮改革中華全國總工會或者建立獨立工會。

一位台灣人：台灣入世後，他自己的工資沒有增加，但物價卻上昇了。對待資本主義的壓迫，他不明白新左派可以是出路。

一位中國內地人士：自己的父母是工人，明白和支持 WEN 和韓德強的說法。歡迎與她討論中國現狀。

一位中國內地婦女工作者：在 1995 年的聯合國婦女大會在北京進行後，中國的婦女組織開始活躍，並影響了其他民間組織運動。婦女在環保、工人抗爭、農民維權中都起到領導作用。她批判文佳筠 WEN 的報告和其他講者的發言都缺乏性別的角度。

韓德強：新左派的改良或許在工人的立場上會被罵為“資本家的走狗”，但他們希望國家不要出現動蕩。現時的危機不是一個階層的危機，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

嚴海蓉：韓德強的言論並不代表台上其他人的看法。

文佳筠：今天發表的是簡報，會在詳細報告中，更多提及性別問題。希望農民的土地權可以得到保留。

2005 年 12 月 16 日

聯合聲明

天下有罪，罪在世貿 抗議警方暴力鎮壓正義的人民抗爭！

發起團體：全球化監察、街坊工友服務處

世貿談判進入第五天，由於警方的阻撓及挑釁，終於爆發大規模衝突。世貿摧毀各國工農生計，因此抗議者反抗警方，正義在人民一方！

任何鎮壓都是站在剝削者的立場上，更可恥的是警方在向人群多次施放催淚彈之前，連警告也沒有，很多記者與旁觀者都受毒害。再者，警方早前宣佈不會使用水炮，但是今日下午卻用水炮攻擊示威者。這一切說明了警方根本是濫用暴力。

世貿成立十年以來，已經造成世界各國勞動人民和自然生態的巨大災難。支配世貿的霸權國家、專制政府和跨國公司，為了一小撮大官僚和大財團的私利，不惜把國計民生都變做買賣。農民因此破產，工人因此失業，環境更受污染。我們受夠了！

人是萬物之靈，不是官商的奴隸。反抗不義是人民的神聖權利，我們呼籲香港市民同情和支持正義的抗爭，反對世貿破壞民生！反對特區政府鎮壓人民！立即釋放所有被拘留者！

2005年12月17日

